



無條件參考外國案例才是有損法治

新聞背後

卓銘

2019年8月18日，民陣在未經警方同意的情况下，於維園舉行「流水式集會」。事後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及李柱銘等7人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並提出上訴。昨日終審法院頒下判定，7人終極上訴失敗，維持原判。終審法院本中就應否參考英國案例，作出了清晰而明確的解釋，說明了儘管同樣普通法制度，但如果不考慮實際情況便無條件參考外國案例，不但對判定不公平，而且更有損香港長久以來建立的司法基礎。

本案的最大爭議，在於香港法院應否考慮英國最高法院的兩宗案例，在判決中採納「執行相稱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測試。因此，具體討論終審法院的判詞前，應該先弄清楚究竟「執行相稱性」究竟是什麼意思。

現代的相稱性原則，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普魯士行政法。當時普魯士法院提出，為符合必要原則，有關措施的力度

不得超過達到目標所需的程度。而據現在歐洲人權法院的定義，在社會一般利益的需求與維護個人基本權利的要求之間尋求公正平衡，便必須確保「執行相稱性」。執行相稱性的方法有很多，現時香港法院慣用的是「四步相稱性測試法」，須檢視：(一)相關措施是否為達成合法目的；(二)與達成該目的是否有合理關連；(三)該措施是否導致該目的所必需；(四)措施對社會利益與影響個人受憲法保護的權利之間是否已取得合理平衡。

本案上訴一方提出，終院應參考英國最高法院兩宗案件的判詞，稱即使是未經批准而不合法的集結，不等同參與者自動失去基本權利保障，法庭必須審視對相關權利的限制是否符合相稱性原則。

惟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及常任法官李義認為，上述兩宗英國案例的法律背景與香港不同。前者只是一宗涉及阻礙控罪和如何構成合理辯解的案件，與憲法挑戰無關；第二宗案件則是北愛爾蘭議會禁止於墮胎中心安全區進行示威，與「流水式集會」案和香港現實都相距甚遠。

再退一步說，就算香港法院同意考慮相稱性原則，採用的方法也與英國的相稱性測試不同。終院判詞指出，英國及香港處理挑戰人權的法律框架不盡相同，例如在香港，如果某項措施被裁定違憲，法庭可以頒令糾正相關措施，也可以直接宣告措施無效以至廢除。但在英國，法院卻沒有類似的補救方案。英國法院無權直接廢除政府推出的措施或條例，因此即是被宣布為不符合人權保障的條文，當地法院也會繼續執行，也會繼續用以檢控和定罪。

英籍法官亦同意終院判決

在參考到以上區別的情況下，終院判詞定下結論，上訴方提出的相稱性測試在本港司法判例中沒有地位，各被告維持原判。值得一提的是，英籍終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也同意終院的這個看法。

從終院就相稱性概念作出的解釋及修正，並因應香港和英國在處理人權挑戰的法律框架方面存在不同之處，而裁定香港法庭不應跟隨英國兩宗判例，都遵

循着一絲不苟的法理邏輯。因此，終院駁回黎智英等人的上訴可謂合情合理。但可以想見，社會上仍有部分人覺得香港行普通法司法體系，就有義務參考英國案例，甚至覺得英國案例必然更具參考價值。

首先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執行相稱性並不表示一切法律限制都要讓位於個人權利。其重點，是在社會一般利益的需求與維護個人基本權利的要求之間取得平衡。而即便是案例原則，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百分百適用，基本法第84條列明，香港特區法院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例如英國、新加坡、加拿大等，但參考與否並不具約束力。如果與香港現實情況差距較大，比如本案的情況，終院認為案例不適用也是在合理範圍以內。

在本案中，黎智英等人在沒有警方批准的情況下進行集會，是鐵一般的事實。而各上訴人就《公安條例》(第245章)第17A(3)(a)條的憲法挑戰早已被裁定為不成立，亦沒有就警務處處長反對

遊行提出憲法挑戰。既然一開始就不存在違憲情況，即便有被告提出「流水式集會有助疏散人群」，或稱這是在行使集會自由的相關權利、集會和平進行等，極其量也只能看作是求情理由，無法從根本改變參與非法集結這個事實。

就如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的回應：「香港居民有遵守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法治的其中一項基本要素，任何人不論種族、階級、政見或宗教信仰，都須奉當地法律為圭臬。」有法必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永遠是法治最基本的原則。

其實，如果有些人硬要借用英國的案例，那麼可以看看，最近當地發生大規模騷亂以來，英國警方大肆拘捕至少700名示威者、考慮禁止示威者蒙面，並揚言起訴外國網民；英國法院亦禁止示威場合中的旁觀者保釋……這些舉措和判定又有沒有考慮過相稱性原則？如果真要參考案例的話，香港法院也應該參考更為相近的騷亂案件，而不是那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案例。

做到「三個結合」實現香港更好發展



胡劍江

香港機遇、作出香港貢獻。

二是與國家改革開放大局結合起來

香港憑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逐漸形成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改革開放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香港企業家敢為天下先、爭當時代弄潮兒，回內地投資興業創業、招商引資引才，貢獻社會公益，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筆者作為潮商的傳承者，見證了潮商先賢從家鄉來港，早期經過艱苦拚搏，白手興家創業，到事業有成後積極參與社會慈善公益活動，服務社群。同時不忘桑梓，為家鄉招商引資、捐資辦學，積極融入國家的改革開放大局，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

三是在與港澳實際結合起來

在現今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形勢下，如果還抱着一成不變的舊思維，定必被時代淘汰。對於面臨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香港來說，同樣要識變、應變、求變，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深入理解和領會三中全會精神，把握機遇，銳意改革，主動作為，加快推進香港由治及興。

三是與學習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

把學好貫徹好三中全會精神的「時度效」、「點線面」、「精氣神」是香港當前的最大政治，也是拚經濟、謀發展的當務之急。筆者認為，夏寶龍主任強調的「三個結合」為香港各界如何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回信精神，為國家做出新貢獻明確了切入點：

一是與學習貫徹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

三中全會審議通過《決定》，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部署，對香港的定位和作用作出清晰論述，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並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繁榮穩定、實現高質量發展指路引航。正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指出，香港工商界素有眼光敏銳獨到、善於把握先機的優良傳統，要抓住機遇，先行一步，率先研究好、領悟好、把握好、落實好全會精神。香港要扮演好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持份者、先行者、貢獻者、創新者，充分認識香港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共性要求、推聖使命和擔當作為，履行香港責任、把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委員會副主席



對於來說，臨同樣要環境深刻變化的、應變、的

改革求變銳意進取 開放應變擴大機遇

議事論事

鐔言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集中展示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和未來前景。全會對中國以至世界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首先，中國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促進國內經濟轉型和引領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大利好。全會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一體化改革，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這為進一步解放科技生產力提供了制度支撐。

創新發展推動新的經濟增長

在國內，國家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不斷加大投入。上半年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0.6%。截至目前，中國已擁有24個全球百強科技集群，首次位居世界第一。隨着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各主要經濟圈科技資源流動更加便利，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創新發展按下加速鍵，湧現出一批代表未來前沿方向的行業和企業。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戰略性產業的突飛猛進，將推動中國加速進入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周期。

在國外，中國與各國不斷深化科技、經貿交流合作，已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科技合作協定117個，共同做大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蛋糕，促進世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加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打開了新天地。挪威、意大利、英國等國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符合世界需求，將惠及更多國家。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事業的穩步推進將成為促進世界發展繁榮與平安的壓艙石。全會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近日，新加坡、南非、巴基斯坦等國主流媒體紛紛發表評論文章，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為其他國家帶來的發展機遇，讚許中國全面深化改革舉措讓全世界受益。湯加前駐華大使拉圖等表示，全會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將為世界各國創造巨大機遇。

一方面，中國將繼續扮演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7萬億元，同比增長5.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高盛、瑞銀等紛紛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為中國經濟前景投下信任票。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對完善全球治理發揮積極示範作用。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提出「三大倡議」，推動政治解決俄烏、巴以等國際爭端，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注入積極、穩定因素。正如多國人士所言，中國智慧和方案持續為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新路徑，展現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

第三，國家健全港澳在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將使香港多領域國際中心建設如虎添翼。全會強調，要發揮「一國兩制」

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可以看出，中央對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比過去更聚焦，對香港發揮相應功能的期待更高，為香港發展預留了廣闊空間。香港應深刻認識自身在國家進一步全面擴大開放中的戰略地位，充分發揮好內通外聯「橋頭堡」和「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作用。

加快香港多領域國際中心建設

在金融等領域，與內地其他大城市相比，香港市場、法律環境對於東西方均具兼容性和普適性，尤其對於東盟、中東等區域更具吸引力，可為國內外資金金融通提供更穩定、高效的投資平台和環境，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和離岸市場發展。在貿易和航運等領域，可進一步利用區位優勢，如低稅制、產權保護、科研創新、高端人才引進及與國際規則順暢銜接等，推動促進新興工業增長的「再工業化」，擴大自由貿易輻射面和航運通關兼容性，在大灣區一體化、對接東盟和中東、共建「一帶一路」等方面，發揮引導作用，收穫更大紅利。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可以預見，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將為自身和世界發展開啓新的機遇大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期待，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單會繼續亮麗，中國與世界同行，必將能夠雙向促進、互利共贏！

香港打造「機場城市」需創新思維

智庫專欄

區浩馳、蕭正元

機場管理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香港的航空客貨運量分別達2530萬人次及240萬公噸，相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前者回升至近七成，後者則已復原至疫情前的水平，目前當局和業界積極提升機場運力，以盡快實現「十四五」規劃對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期望。

釋放機場橋頭經濟價值

要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突圍而出，除了取決於機場的客貨運量外，也要加快從「城市機場」到「機場城市」的蛻變，把純粹的飛機搭乘設施擴展成高增值產業匯聚的城市綜合體。新加坡和迪拜都在積極布局機場城市，他們的成功經驗可供香港借鑒，有助促進機場城市建設進程，加速釋放機場的橋頭經濟價值。

早於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已建設佔地約70公頃的「樟宜商業園」(Changi Business Park)。這個毗鄰機場及樟宜工業區的園區成功吸引了不少知識密集型企業、研發機構及金融機構後勤部門進駐。隨着周邊有更多產生協同作用的設施相繼落成，包括博覽中心、購物中心，以及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等，逐步形成一個與機場互惠共生的創新商業社區。

新加坡也持續把握機會為機場城市添磚添瓦，例如乘航廈擴建工程之便，一併重新規劃相連的露天停車場，重建成為「森林谷、

瀑布雨漩渦」為設計亮點的綜合娛樂零售空間「星耀樟宜」(Jewel Changi)，樟宜機場憑此一躍成國際性旅遊地標。配合第五航廈2030年後落成的契機，新加坡當局提前將周邊土地規劃為樟宜東商業休閒區，並翻新區內跨境渡輪碼頭以提升海空轉乘體驗。此外，當局也在加緊推動樟宜東工業區的規劃工作，以擴充機場的航空貨運處理能力。

至於迪拜，航空業貢獻當地生產總值近三成，對當地經濟舉足輕重，其機場城市建設主要體現在位於機場北邊的「迪拜機場自由貿易區」(Dubai Airport Free Zone)，區內提供一系列招商引才優惠，包括准許全外資擁有權；免除所得稅、公司稅和關稅；安排貨物快速通關；不設聘用外籍人才限制等，至今吸引約2800家企業進駐，曾被評為全球最佳自貿區。迪拜當局更積極發展低空經濟，計劃在機場、市中心、棕櫚島和濱海城等旅客必到的之處設置垂直升降機場，供空中的士(Air Taxi)上落客之用，預計2026年開始投入服務。

強化機場產業生態引領作用

總括上述兩個城市的經驗，可歸納出三大機場城市的重要特質：

一是在機場周邊持續增添能產生協同經濟效益的設施並制定專門政策，促進產業生態圈的擴張及發展；二是在機場內打造地標性設施，將機場消費造成旅客願意停留，甚至專誠前往玩樂消費的多功能旅遊熱點；三是在土地規劃、交通基建，及創新科技方面作

超前部署，確保在全球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

而香港在建設機場城市方面，進度在全球範圍並不算落後。一方面，機場周邊早建成一些具協同價值的設施或交通基建，包括亞洲博覽館、空運貨站、港珠澳大橋及香港口岸人工島等，與機場發展相輔相成的東涌新市鎮也發展成一個配套成熟的生活社區；另一方面，一批新設施將於未來一兩年內陸續啟用，而其中的「11 SKIES」娛樂商業綜合項目更有望成為旅遊地標。然而，雖然香港機場城市硬件規劃大致到位，但如果不在細節、協調、管理和創新方面持續下工夫，也難在高度競爭的國際航空樞紐競賽中佔上風。

因此在盤活產業生態圈、打造經典旅遊地標，及前瞻性規劃等關鍵事項上，機場城市各持份者須長期保持緊密合作和發掘創新思維。

舉例來說，除了繼續推進連接東涌的自動駕駛系統，能否也同時部署水上交通接駁，例如新增往來東九龍市區航線，甚至是增設面向遊客的南大嶼觀光航線？除了鞏固空運物流等現有優勢產業，如何通過細節安排和產業政策，助力跨境金融及醫療等新產業發展，促進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人員、資金、貨物等要素流動，擴大機場產業生態？如何利用好機場城市場景，加速推動低空經濟等前瞻科技概念？這些都是催谷客貨運量以外，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的重要因素。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實習生